

观念史研究的文化视域

郑文惠

一 观念：指向于一种社会巨大能动的心理系统与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信仰

观念史研究，总因应着时移世变而推进学术研究的变革。

观念既无法逸离于社会，又无法超越于现世；因而，观念总立基于现实，反刍于社会。观念史研究，主要在揭示不同文化场域下观念的独特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诸如单元观念（unit-ideas）与观念丛（idea-complexes）内在的关系实态与互动形态；新旧观念彼此之间或分润濡染、或颀颀竞争、或协商调度，进而孳乳、续衍，甚或变异、汇通，终至约定俗成的形塑、定型过程；观念的源起、演变、以及传播、接受的历史变迁与地理越界的跨文化徙动；观念外显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的整体运作机制，尤其是概念价值化、社会化过程中凝塑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系统，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这是一种关乎观念的社会化实践的总体历程，指向于一种社会巨大能动的心理系统与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信仰；一种与历史变迁相关、根植于深层意识的心理性建构与文化动能。

二 越界的研究图式：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考掘学

观念史研究，当是最能呈显概念价值化、社会化的总体历程及领域越界出位、错位的人文模态。

概念与观念以其独具的抽象性，往往须凭借图像、仪式、语汇等形象隐喻，以凝聚情感，引领行动。图像、仪式、语汇等文化符码作为观念再现的主要中介，不免成为文化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形象修辞与视觉再现，也从而构筑出一门复杂的文化象征学，而屡屡在历史行动或文化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关键性环节。

一般而言，概念价值化的过程，积淀为理念型概念，而内蕴、深植、固化为观念，因而，或可说

概念价值化发显为置固化的观念，是概念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价值性渗透和影响。词汇、图像、仪式等美学修辞与隐喻机制，是提供观念再现的一种主要媒介，即使隐喻与概念的属性、意蕴深藏在文化内部结构中，而佚失其明显的外征，然正因概念不仅提供、赋予了社会经验以意义框架，也建构、开启了对世界认知的智性范畴；从而更积淀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系统，支撑着理念型概念的流布、承续，乃至单元观念与观念丛之共体互用、转植错生，甚或变化重组、再铸生新，而更进一步调动起社会行动与文化再造的契机与转机。是故，观念史研究总以一种跨领域、跨学科的脉络史研究的文化视域，俾能擘画出其中互织错迭如云锦之多层纹理、濡染融渗如水墨之多样姿采。

这也是为何观念史研究之初，已然指向一条跨领域、跨学科的脉络史研究路径。勒夫乔伊曾言：学者各自在他们的秘室里彼此孤立地极其仔细地研究已然被裂隔为文学、艺术、科学、神学、教育、社会思想等学科，致使原共属于西方思想体系的有机体，被强行分割、肢解而无复生命，故而，倡言唯有“观念史”才能使之起死为生[勒夫乔伊(Arthus O. Lovejoy, 1873~1962)著，张传有、高秉江译《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正因观念史在19、20世纪之交因应着科学主义忽略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取向，对人文精神产生莫大的扼抑、斲伤而兴起，诚如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4页]，历史正因能以“心灵重演”，再现事件行动者的思想与动机，故而，历史知识才能浓缩(incapsulated)于今日的思想结构中[何兆武、张文杰《译序：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21~22页]。由于史料作为人的社会行动记录,记录者是以一种可理解性,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情境去认识、理解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情景和支配其发生的观念系统,以重演历史上(文本中)观念支配事件的过程[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历史事件的核心是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受动机支配,动机又和价值系统与观念互相关联。因而,将“拟受控实验原则”运用于判断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行动的真实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430页],这也使得观念史研究居于历史与哲学的交界线上(Franklin L. Baumer 著,李日章译《西方近代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页),也唯有立足于历史与哲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观念史研究,方得以掌握历史事件与行动者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才能使学术研究复归于终极性的人文关怀之中。

再者,观念史研究更是一门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考古学,提供了越界研究的可能方案与基本图式。无论菁英或常民之世界观都是由诸多观念或概念组构而成,而观念或概念的具象展演,无非是借助于各类形象如图腾、图像、旗帜、仪式、词汇而具形。尤其是概念或观念在进行文化交涉的同时,往往需要将词汇、仪式与图像及概念与隐喻转为智性工具的实体部分[鲁道夫 G.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著,吴亿伟译《中国的“睡”与“醒”:不对等的概念化与应付手段之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第9页],方能在文化重组和转化之际,使概念或观念有效地被接受与反应。因而,认知观念与社会的互动,尤须透过领域、学科越界的脉络史分析,了解观念的流通、反刍、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中,如何以一种词汇、图像、仪式等美学修辞作为多重中介,进行复杂而动态的概念化隐喻与象征。词汇、图像、仪式等形象修辞,作为一种观念再现的美学载体,向来包孕着复杂而隐微的隐喻与象征;观念与词汇、图像、仪式所建立的多层次隐喻关系,关乎彼此之间转喻的逻辑力度、情感张力;词汇、图像、仪式作为观念的一种文化再现,尤藉由一套形象美学修辞建立彼此的依存关系与转喻机制;观念寓栖于词汇、图像、仪式的文化再现空间中,一个个形象修辞所建立的象征符号,毋宁是观念再现的重要美学载体。因而,词

汇的历史语义学分析或图像、仪式等形象修辞与概念隐喻的文化发掘和概念、观念变迁研究,宜紧密建立起联系。

如,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伦常等级建立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王朝。在依伦常等级所建立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中,国家是道德共同体的实体,儒学是终极的社会理想蓝图;汉王朝选择儒家为社会正当性的基础,依等级制规范推向家庭、社会、国家,家作为伦常等级的关系之“实然”,为上层皇权提供合理性的统治依据;文士与庶民在儒学想象的道德共同体中,服膺并遵从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然”的反馈机制;由于官僚机构、士绅和宗法家族背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本属“应然”领域,但汉代由天到人的道德推理模式,实质混淆了“应然”领域与“实然”领域,“天人合一”和“道德价值一元论”所导致的“应然”领域无限扩张,使得儒家意识形态具有抗拒证伪的机制[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面对灾异、吏治腐败等社会结构性危机时,往往被误识为偏离德治之道,于是反而更加置固化对儒家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强化道德意识形态认同。东汉祭祀—死亡空间存在着大量的历史故事画像,及与“哀时命”主题相关的修身养德、怀荣名等道德范式的文学书写,实质上或可视为是道德意识形态认同的一种文化叙事。忠孝节义故事之具三纲五常的道德图像,无非是在天人合一思维图式下,实践家国同构关系的重要文化想象媒介。忠孝节义历史故事是一组人伦道德的模范群,在规范化的人伦空间中,透过家—宗族—国的反馈模拟运作机制,使人在道德意识形态认同中,找到道德的归位与情感的认同[郑文惠《礼教图式与死亡信仰——东汉武氏祠历史故事画像之文化叙事新论》,《励耘学刊》文学卷,2010年第1辑,总第1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及《文学与图像的文化美学——想象共同体的乐园论述》(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版)一书]。然而,东汉末期灾异频繁、皇帝专制、外戚宦官干政、党锢之祸、吏治腐败等社会总体危机濒临毁灭性崩溃之际,价值逆反成为响应“哀时命”的另一种心理机制。道德意识形态的价值逆反呈显为一种“以无为有”的思想样态,道家“自然无为”成为破除

儒家道德规范的一种新道德、新价值；表现于文学/图像文本空间中，多呈现为永生仙境之图式，及或隐逸求道，或求仙自保，或及时行乐，以回应时命不逢之境及消解时命不逢之悲[郑文惠《集体共感与生命悲歌——汉代文学/图像“哀时命”的文化叙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第七届汉代文学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一文]。则知东汉出现大量的历史故事画像、永生仙境图式及求仙求道与享乐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各自表述着强化三纲五常道德意识形态认同及道德意识形态全盘性价值逆反的一种观念再现。文学/图像之形象修辞与概念隐喻，乃是作为一种观念再现的美学载体。

又如“瓜”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的美学符码，《诗经·大雅·绵》借由绵绵瓜瓞，岁岁相续不绝之形象，引喻周太王率族人迁至岐山，奠定了王业根基；后用来祝颂子孙繁衍昌盛。在宗法社会中世俗常民以之作为传宗接代，子孙繁衍、世代绵延的吉祥寓意，而涵具了生命繁盛、代代传衍的文化隐喻；遭逢世变的遗民如钱选作“秋瓜图”或溥心畲作“瓜图”等，乃挪借《诗经》绵绵瓜瓞之形象并迭陈了东陵侯召平亡国隐逸之文化故事，以“东陵瓜”作为不认同新政权之反同化的文化诉求[郑文惠《遗民的生命图像与文化乡愁——钱选诗/画互文修辞的时空结构与对话主题》，《政大中文学报》第6期(2006年12月)一文]；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文化扩张主义与帝国霸权思维的侵袭，又再演绎为“瓜分图”；凡此，乃因“瓜”的形象图式，作为一种生命绵延传承的文化隐喻，早已成为士夫与常民内置的感觉结构。如香港1899年7月19日谢缵泰(1872~1937)将所理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绘为《时局全图》(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在以熊、斗牛犬、青蛙、老鹰等动物象征列强诸国，各自控制部分中国领土的政治讽刺画中，传递了中国与列强间主动权与权力不对等的政治现状[鲁道夫 G.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著，吴亿伟译《中国的“睡”与“醒”：不对等的概念化与应付手段之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第14~35页]。图左上角诗云：“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即挪转传统“瓜”形象之内置感觉结构为帝国强权瓜分中国国土之隐喻，分裂之“瓜”，已然是近代中国国族在列强蚕食鲸吞下生

命存有的转喻性符码，“瓜”作为一种观念化的视觉再现，与晚清时局共构、绾连为国族生灭存亡的文化隐喻。因而，“瓜”作为形象隐喻与视觉再现的美学修辞策略，在近代中国是与国族存亡与权力不对等观念共构为一个整体而不能分割的隐喻关系与象征维度。是知文学/图像[鲁道夫 G.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曾反省、批判概念史研究大多固着在对单一语言的词汇研究(或是被认为单一“同质”文化环境如欧洲或东亚)，而对隐喻、明喻或图像等其他媒介则避而不谈。即使对隐喻的研究则专注其语言与哲学方面的特性或是使用史上，对其所属的思想与概念史，只稍稍提及。但观念需要隐喻与明喻以求与别的观念进行统合，而使之具体化到足以提示某种行动与方向。因而，隐喻与明喻迫切需要图像与语言媒介以凸显种种燃眉议题。参上注第10页]大多从具寓意性的文化知识仓库里，采掘已然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或内置为感觉结构的文化原料，再造新的文化隐喻工程，以调动起社会行动与文化再造的巨大心理动能。

因之，观念史研究，以一门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考掘学，提供一种文化越界的研究图式。

三 文献数位化的观念之域：数位人文学视域下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流动与交流

观念史研究不仅是一种立足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界线上；它同时也是在传统研究专重经典文本、精英观念，转而致力于影响民众社会和政治“基本概念”或“主导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及其实际运用与社会文化影响[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的一种新视野与新宣示。尤其是新的世俗主义认为所有的经验都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日常生活的观念系统中，世俗的经验皆被视为自我发展[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著，李继宏译《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前提。因而，观念史研究尤须关注文化接受主体的内在多重结构，以及能动实践的可能性，诸如文化生产的物质性整体配置与社会交往的技术媒介(medium)及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语境。文化传播与接受的

技术性意义及文化叙事上的模拟与转换,往往无形中刻画出日常生活的权力网络与观念系统;至于新的再现策略(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促使集体记忆、共同体之文化叙事有了新的再造与重构的同时,势必交织、错杂着认同/反认同之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竞逐;意识形态合法化、正当化的认同机制一旦被启动,必然带来某种“共同行动”的可能,而重新凝聚集体认同;在需要一种新的阐释以置换价值代码并取得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当下,一定程度上也隐匿了某种文化暴力,但也开启了新的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认同。这是一个观念与事件、社会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

尤其,观念史研究,又是察考转型期或过渡期文化状态下观念之思想轨迹与文化事件、社会行动的关系样态的研究新视角与新方法。随着全球化的文化徙动与地理越界,概念的流布与观念的形塑,层罗密织为跨文化和跨语言流动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一旦词汇、仪式与图像等不同媒介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甚至是历史的边界,原本概念或观念与语汇、仪式、图像乃至形象隐喻的同质(homogenous)关系不免呈现出紧张、紊乱的样态,进而开启了彼此驳斥,商讨等特殊动力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文化协商与文化交混的机制,尤其在近代极度不对等的跨文化互动与交流中,概念是世界共有的重铸近代语言重要的一部分[鲁道夫 G.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著,吴亿伟译《中国的“睡”与“醒”:不对等的概念化与应付手段之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第9、13页],因而,在文献数位化的新时代命题下,要追索近代全球化浪潮下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流动与交流中概念的流布与观念的形塑,世界各国、各区域必须长期合作并发展包括文字、图像等文本,及涵摄经典文本、精英观念、民众基本概念等研究型数据库,作为跨文化和跨语言之文化交涉之共同知识文本,并开启人文思维与数位方法结合的数位人文学的观念史研究新视野与新方法[随着知识微缩时代的推进,庞大而易于利用的数位资源尤有助于进行跨时段、跨地域、跨领域、跨文化的观念史研究;研究型数据库的开发与建置及“数据挖掘”、“关键词丛”、“共现词频”等数位方法的揭示,进一步开启了“人文研究思维”与“数位思维逻辑”结合的观念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台湾政治大学由金观涛、刘青峰二位教授所带领的“中国

现代认同的形成与演变”研究群,或以宏观角度观察“主义”一词的产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及其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或采用关键词丛分析方式,透过“共生词汇”对关键词进行定义,以看出“观念重层性”建构的模态;或以“华人”观念起源为例,进行“共现”词频之分析;或以清末预备立宪为例,借用语言学“齐夫定律”进行社会行动的数位研究;或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关于华工的相关史料,分析词汇的语境与共现的现象,论析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于中文史学文献分析之应用等,这是观念史的数位人文研究的新探索。参詹筌亦、王乃昕:《“主义”的数位人文研究》;邱伟云:《关键词丛与文本意义挖掘的尝试:以〈清季外交史料〉为例》,分别收入项洁主编《数位人文在历史学研究的应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19~245、159~188页。金观涛、邱伟云、刘昭麟《“共现”词频分析及其运用——以“华人”观念起源为例》;金观涛、姚育松、刘昭麟《社会行动的数位研究——以清末预备立宪为例》;刘昭麟、金观涛、刘青峰、邱伟云、姚育松《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于中文史学文献分析之初步应用》;分见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台湾大学图书馆主办:“第三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2011年12月1日至2日)会议论文集。另数据库研究法,金观涛、刘青峰《导论:为甚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6页。数位人文学之介绍,郑文惠《从概念史到数位人文学——东亚观念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一文],则有朝一日,观念史研究社群以一种协作思维与探索精神,共享分析工具与思想资源,透过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跨领域的研究合作与资源整合,当能更为有效地拓植、深化相关学术议题,并推进观念史研究革命性的蜕变与突破。

收稿日期 2012—06—30

作者郑文惠,文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现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政治大学与韩国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发)。